

安庆人张友鹤创办《南京晚报》的往事

纪习尚

《南京晚报》由安庆人张友鹤（1907—1971）创办，设在南京益仁巷润德里，是一张四开“小报”。每天下午出报，第一版广告，第二三版国内外要闻，第四版副刊。零售每份铜板三枚，订阅每月大洋二角。

作为一份私人经营的报纸，它堪称传奇。从1929年5月16日到1949年5月15日，它坚持出版了整整20年。在无数报纸有如走马灯的时期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20年中，它从南京迁到重庆，又从重庆迁回南京，经历了两次大的停刊、复刊；这中间，还因为新闻审查、敌机空袭等原因，有过次数更多的临时停刊。但一次又一次，它都绝处逢生。是什么原因让它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？答案就在创办人张友鹤身上。

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，张友鹤有三个优点，一是脾气温和，从不得罪人，有人要和他过不去，他也置之不理。一家报社要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，不能忍是绝对不行的；二是勤奋耐劳，他“沉默寡言笑”，没有其他爱好，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，只知道“埋头办报”。他每天很早就到报馆，吃过两块烧饼或一碗面后，即开始写稿、编报，和报纸有关的大小事情他都要详细过问；三是性格坚韧，认准的事情绝不放弃，他的前半生只干了主办《南京晚报》这一件事，新中国成立后则专心从事古典名著校注，心无旁骛。

二

张友鹤出生在安庆一个富裕家庭，祖父曾任安徽太平县知县，父亲曾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员。他从小喜欢写作，中学时就经常向《申报》《时报》等报刊投稿，大学肄业后，他曾短暂担任语文教师，但业余时间仍坚持为报社写稿。1928年春，他经胞兄张友鸾（1904—1990）介绍，进入《民生报》编辑副刊，从此正式进入新闻界。张友鸾在当时已经是知名报人，主编过多份报纸，在报界有些地位，弟弟张友鹤有志自办一份报纸，实现新闻理想，他也乐于从旁相助。于是，1929年，张友鹤在胞兄的协助下办起了《南京晚报》。

办报纸，最难的是经济问题。引导张友鹤进入新闻界的张友鸾，是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，毕业后又有十年办报实践经验，曾于1933年尝试创办《南京早报》，但不久之后就因资金问题，不得不转让给他人。对于失败的原因，张友鸾回忆道：“我只是书生办报，天真地幻想，用小小积蓄作开办费，报一出，卖报和广告费的收入，就可以供周转。其实大谬不然，《南京早报》出版以后，赔累不堪，我的积蓄完了，我妻崔伯莘变卖首饰支持我。”

张友鹤也是书生办报，面对的困难一点不比张友鸾少。张友鹤的



创刊初期的《南京晚报》（作者供图）

儿子张传厚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，为了筹办《南京晚报》，张友鹤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七八百元，自己又跑了几十元的广告费，加上他的另一位忘年交王宠惠帮忙拉到的三百元广告费，就凭借这大约一千元，艰难地印出了第一张报纸。

出版报纸，每一天都需要钱。开始时，《南京晚报》的销量不大，广告收入也有限，报馆入不敷出，亏空很大。当他在编辑室中奋笔撰稿时，外面常有索要账款的人大声吵闹，让他窘迫不堪。而张友鹤又抱定了“为新闻而新闻”的立场，不愿意也无从获得官方的“补贴”，资金问题只能自己解决。第一年里，报纸有好几次因为无钱印刷，几次面临停刊，依靠张友鹤个人举债、典当，才勉强支撑下去。

三

为了生存下去，张友鹤从广告和发行两方面，尽力为报馆开源。首先是多拉广告。从1929年5月到1935年8月的六年多里，报纸的第一版都是留给广告商的，价格每平方寸1.2元，二版到四版也有相当数量的广告，每平方寸1.2元到1.5元不等，中缝每平方寸一元。广告多会让部分读者不满意，但为了多些收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更重要的是发行。《南京晚报》从发起筹备到最终出版，只经过了十几天，但在发行方面，张友鹤还是下了不少功夫。在城外的下关，他设置了分销处，每天下午报纸出版后，即用汽车运送到永宁街的夏万泰商号。在南京城区，他与五马街的胡宗宪派报馆，以及奇望街的孙福年派报馆合作，由他们代理订阅和派送业务。为了将报纸尽快送达，以便订户“公余回寓之时阅读”，《南京晚报》还承诺使用自行车派送。下午六点左右，一定会有“叮铃铃”的车铃声在订户门口响起。而如果派送出现了延迟或遗漏，《南京晚报》将“立即更换报差”。

晚报的主要销售渠道不是订

阅，而是街头零售，市民可以通过穿梭在街巷的报贩，随时购买。《南京晚报》也与报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每天晚报出刊后，南京的街头都会响起报贩们“晚报！晚报！”的叫卖声。创刊一年后，靠贩卖晚报为生的，已经超过百人。

曾有一位头发蓬乱，但脸蛋红润如柿的报童，每见到潜在读者模样的人，就一定跟上去兜售，直到对方购买一份《南京晚报》才离开。一位被他纠缠的读者起初不胜其烦，但后来竟习惯于报童的这种执着，一定要从他的手里购买一份晚报才安心。还有一位在夫子庙奇芳斋清真茶社楼下叫卖的女报贩，每晚必到，风雨无阻，“晚报咯~南京晚报咯~”的清脆声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创办八个月后，南京市民逐渐接受了这份报纸，《南京晚报》销售量快速增加，收支逐渐平衡。根据当时的报道，1929年底，销量达到2000余份；1930年春，距离创刊还不到一年时，销量上升到了3500份；1930年10月，销量更达到约5000份；几年后的高峰时期，曾有日销一万五千份的成绩。在南京的各家晚报中，《南京晚报》取得了第一，坚韧的张友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住了脚。

四

张友鹤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，在《南京晚报》的发刊词中，他说：“吾人为报纸而报纸，既不愿报纸成为一种机械，更不愿以吾人自身为机械而办报纸。”他的愿望是办一份说真话的、纯粹的报纸，而不是打造一个名利场。将生动有趣与客观真实结合在一起，就是《南京晚报》的办报原则。

社会新闻（本地新闻）看似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小事，但它发生在读者的身边，最能引起阅读兴趣。社会新闻的数量和质量，是一份晚报成功与否的关键。

开始时，《南京晚报》主要以“秦淮月”副刊为卖点，力求通俗、有趣、贴近生活。“秦淮月”在征稿启事中说：“一切投稿都欢迎，滑稽文欢迎、议论文也欢迎。”小笑话、废话一束、有趣的小新闻、章回体小说连载等，只要能吸引读者的，无不刊登。1929年5月，晚报推出了《小物件的烦恼》系列，塑造了一个名叫“小物件”的南京青年，为了追求爱情而演出了一幕幕滑稽戏。1936年7月，又开始刊登广受欢迎的《克先生外传》，用漫画的形式，描述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。

为了增加社会新闻的分量，《南京晚报》还以高价征求“社会爆料”的

方式，发动市民提供“软性新闻”。有价值的爆料最高可奖励5元，相当于两年半的订报款。随着“访员”队伍逐步建立、与社会方方面面沟通渠道逐渐畅通，社会新闻的内容也日趋丰富。从邻里纠纷、家庭矛盾，到抢劫偷盗、杀人放火、闪电雷击，以至菜谱、物价信息等等，涵盖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五

《南京晚报》这样一家私人报纸，坚持“客观真实”的原则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创刊不久它就因一篇报道，被政府勒令停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929年8月11日，《南京晚报》在第二版刊登了《古应芬为粤省主席》的“政局更动”新闻。当局发现后，认为与事实不实，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前来调查。办理人员劝诱张友鹤说：“你如果肯说出新闻的来源，我们就不追究报纸的责任。”张友鹤则答复：“新闻来源，向例不能告人，此为新闻道德问题，报纸本身愿负完全责任。”当局见他不肯就范，只能以停刊作为处罚。8月24日，《南京晚报》被迫暂停出版，后经多方奔走，才在19天后获准复刊。

《南京晚报》不媚上的风格，还有一件趣事作为证明，叫“汪精卫怒订南京晚报”。1932年7月间，“秦淮月”副刊频频刊文挖苦汪精卫。汪身边的工作人员，将这些报道做成剪报送给他看。汪精卫看后不置可否，但要求手下订阅一份《南京晚报》，作为长期的关注对象。

张友鹤并没有就此收手，7月27日，又刊登了一篇更为大胆的《五院批判》，将国民党当局的“五院”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文中，“行政院”被比喻为“勾栏院”，“立法院”被比喻为“疯人院”，“监察院”被比喻为“养老院”。这可犯了大忌，“中央宣传委员会”读到这篇文章后大为光火，认为“南京晚报副刊秦淮月，七月二十七日载‘五院’批判一文，乃完全为谩骂，殊属非是”，并致函南京市政府，要求对《南京晚报》严加警告。

这些难题，张友鹤都一一化解，他的坚持和付出，也有了收获。当时的评论者认为：《南京晚报》在内容方面颇为独到，“该报除一部消息由各通讯社午稿供给外，自己亦时有特别消息”，上海等地的报纸经常转载它的报道，赢得了新闻界同行的尊重。

